



## 拍下《永乐大典》(引子)

《历劫重光的旷世宏编——〈永乐大典〉》  
陈红彦著 文物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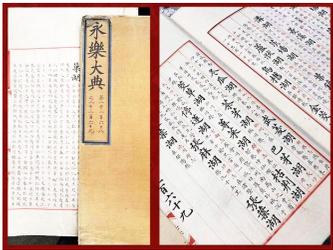
本书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撰写,全书分八个板块,详细介绍了《永乐大典》正本纂修、副本抄录之经过,并通过盘点其装帧,展现了《永乐大典》的皇家气质。此外,还通过其他视角的讲述,梳理出《永乐大典》的价值、流散、回归、再造等脉络,兼具专业性和普及性,是一部了解《永乐大典》的绝佳读物。

提起《永乐大典》(见图,局部),不仅是研究者特别关注,就连普通民众,甚至中学生都倾注了热情。

时间回到2020年的夏天,7月7日,法国巴黎德鲁奥拍卖公司正在激烈竞拍一件中国文物,起拍价一万欧元,短短几秒钟,这件文物的叫价就突破50万欧元,一分半钟之后,竞拍价甚至突破拍卖公司显示屏的极限,无法显示了。11分钟后,这件文物以640万欧元的天价被一位中国女士拍下,这就是两册嘉靖副本《永乐大典》。

当时出国不便,接到拍卖的消息时,国内的公藏机构已经来不及运作,文物系统的领导们不断联系,希望把握住这次机会拿回拍品。听说最初是故宫博物院的翁连溪先生在境外得知了消息,他目验过拍品,并推荐给浙江下沙奥特莱斯的老总金亮先生,实力雄厚又有爱书情怀的金总于是准备出手。金总委托在法国的朋友去竞拍,那位在现场举牌的女士就是受托人。

拍卖这天,我曾发信息预祝金总竞拍成功,金总在拍得之后特别回复我“拍到了”,时间是北京时间23:03,这条信息我现在还保存在手机里。之后,我的微信不断被刷屏,大家为此都激动不已。对中国的古籍人而言,这注定是难眠的夜晚。竞拍的成功意味着两册



《永乐大典》回家了。

虽然两册《永乐大典》拍得,但当时出入境不畅,如何尽快取回拍品,金总为此着实伤透了脑筋。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的领导非常关心《永乐大典》入关的事情,愿意提供帮助,浙江、上海的上级单位也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和具体的支持。终于,2022年1月19日,两册《永乐大典》从法国启运回国。

非常荣幸的是,受金总的委托,我和翁连溪先生远程监护了装箱启运的过程,这也是令我永远难忘的事情。通过手机连线,看着一年半前拍到的国宝从异国他乡装入运输箱,踏上回家的路,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过去的收藏家多追逐宋版书,有“一页宋版,两黄金”之说,现在《永乐大典》的成交价一页要五六十万人民币,比一两黄金多得多。

《永乐大典》完整的时候11095册,现在仅仅存世400余册,为什么一部百存三四的残书,还受到如此关注?



## 柳宗元的岳父打压韩愈?

《大唐孤勇者:韩愈传》  
谷曙光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6月出版

本书以微观、历史现场般的描述和分析,同时旁及韩愈同时代的文人、政治家及中唐政治风云与文学,倾情讲述韩愈跌宕起伏的一生,带你走进历史上真实可感、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儒者韩愈。

唐代的观察使,乃地方的军政长官,权任甚重。柳宗元的岳父、湖南观察使杨凭有没有刻意打压韩愈?如果没有,“州家申名使家抑”又作何解释?杨凭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如何?从韩诗字面看,确实实有人压制。今人钱仲联言,杨凭“自必仰承(王)伾、(王)叔文一党意旨,公与署(指韩愈和张署)之被抑,宜也”。这种说法,流传很广,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还是显得简单化了。

杨凭亦是中唐时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交游广泛,颇有文名,与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俱有交往。特别是柳宗元,13岁就与杨凭之女定亲,当是两家有旧,而杨凭极为看重、欣赏柳宗元的才华,才订下少年姻亲。可惜婚后三年,杨氏女即夭亡。柳宗元未再正式娶妻,见出伉俪之情。即便妻早丧,杨、柳翁婿之间也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然而,从现有材料,看不出杨凭对永贞党人的态度。考量杨凭与韩、刘、柳的现存诗文,体会其中情意,自然是与柳宗元、刘禹锡更亲近,而与韩愈仍有一定距离。

有意味的是,韩愈之兄韩会跟杨凭就是故旧,而韩愈与杨凭、杨凝兄弟及凝子仪之,均有交往。相比而言,韩愈与杨凝父子似更熟络。

韩愈被贬阳山令,往来经过湖湘,皆曾联络杨凭,且量移离开时,过湖南,还献诗一

首。韩愈的这首五古《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非常重要,其中要紧的句子是:

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絳灌共谗谄。谁令悲生肠?坐使泪盈脸。翻飞乏羽翼,指摘困瑕玷。

显然,韩愈是向杨凭倾吐苦水、申诉委屈,他把自己比作屈原、贾谊,冤屈非常,不但有人妒忌,更遭人谗谄。被人泼了脏水,指指点点,却无法辩解;受到戕害,远谪岭南,更无人援手。韩愈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单从诗,看不出杨凭对韩愈有压制,或韩愈对杨凭有责怪。但韩愈是一肚子委屈,要向杨凭申诉,更隐晦写出了心中的芥蒂,这是没问题的。

杨凭或许没有直接压制韩愈,一个很大的可能是,杨的观察使署中的幕僚,对如何处理韩愈意见不一致,聚讼纷纭。韩愈从来都是个“争议人物”,在人生和官场的多个阶段都遭到诋毁,这是确定无疑的。杨凭可能会把衙署会商的情况告知韩愈,表示他这个观察使,也有为难之处,没有办法缓颊或施以援手。用今天的话讲,不是我杨凭不帮忙,而是你韩愈的“群众基础”不好,口碑不佳。杨凭的解释,无疑会让韩愈感觉更加委屈,以至于泪流满面。这才是“指摘困瑕玷”的确解。

我如此推测,还有一个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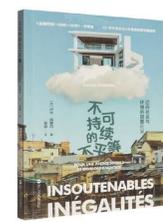
证,就是韩愈不久后作的《祭郴州李使君文》。与韩愈交好的李伯康刺史,不幸在这一年的十月卒于任所,韩愈为他作了祭文。文中的一些句子,是颇有意味的,如“美夫君之为政,不挠志于谗构”,是说李伯康乃君子,不会以谗言构陷人。这不正说明当日在湖南谗构韩愈的另有其人吗?“遭唇舌之纷罗”,则形容对韩愈的说长道短,而李刺史是“洞古往而高观,固邪正之相寇”,洞察是非邪正,坚决站在韩愈一边,为韩愈披肝沥胆,不惜与人抗争。韩愈“幸窃睹其始终”,目睹了李刺史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激于心。虽然更详细的情况不能知悉,但祭文足证韩愈在郴州待命时,遭到过严峻的物议批评,这无疑对韩愈的处理结果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综合判断,说杨凭故意压制韩愈,是存疑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观察使的杨凭,在处理韩愈这件事上,涉嫌不作为。而且,杨凭没有力排众议,甚或顺水推舟。我还想说,政治上的是非曲直,很多时候是看“立场”的。杨凭未必就“站队”“二王刘柳”,但以他的立场看韩、柳,评判短长,更倾向于柳宗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即便不明确表态,内心还是会有所偏向的。杨凭与韩愈往还,诗酒唱和,都是人之常情;但当碰到关键问题,涉及出处进退,是否援引帮助,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在那些已饱受不正义之苦的社会中,新冠病毒大流行让不平等雪上加霜。大流行导致了一连串的企业倒闭和破产,毫不意外,工作不稳定者、低收入者、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作者首当其冲。女性所承受的比男性更甚,黑人与拉丁裔女性所承受的则比白人女性更甚。社会、种族、性别等各层面的不平等相互交织。

这场危机除了带来一连串悲剧以外,也带来了机遇。但我们仍然需要下决心去把握它。为此,我们首先要理解其中的关键: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不平衡在起作用,以及它如何与我们的经济、政治、生态体制中现存的缺陷相结合?为什么近几十年来的环境失调首先是个社会问题?为什么生态是社会不正义的一个新领域?全世界的社会和生态危机是如何造成的,社会又如何面对?

20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向现代产权制度的过渡,我们的社会从中沿袭来



## 未来的世界如何建构?

《不可持续的平等:迈向社会与环境的双重正义》 [法]卢卡·尚塞尔著  
吴越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

我们能在阻止环境危机的同时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吗?摆脱贫困的过程往往要消耗更多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压力,而治理污染的措施反过来可能导致失业激增、物价上涨,最终由穷人“买单”。面对这一两难问题,法国经济学家卢卡·尚塞尔在本书中提出新的见解:社会正义和绿色世界的目标可以兼容,但需要公共政策做出实质性转变。

了一种癖好,选择了不平等与环境危机:一方面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考虑分配和污染问题),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贫困化而私人领域受益。我们需要好好剖析这个(或这一系列)选择,以便了解如何在新冠疫情后、在环境限制下重建一个新世界。

当然,更好地了解政治选择与当前产生混乱的原因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些事件过后我们要怎么做?这几行字落笔之时,我自己正处于两类人之间:一方是崩溃论的拥趸,另一方则认为共享与慈善将取代商品化而急于宣布新世界的降临。危机过后,人类社会可以

变得更好,也可以变得更糟,没有什么事先写好的剧本。未来属于那些懂得从过往中汲取教训并且为一个真正的社会规划团结奋斗的人们。

一个国家懂得在危机过后改弦更张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重创之后,欧洲国家重新团结起来,创建了全民社会保险,取消了战争遗留的债务(1953年伦敦会议),以便投资于未来。再更久远一些,美国通过重新定义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并且将商品领域“重新嵌入”政治领域,走出了1929年骇人的经济危机。

还有离我们更近的例子:

2002年至2004年的“非典”流行过后,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等地区懂得调整其应对危机的政策,对新的流行病建立起反应性极强的机构和操作模式。

但是,由于人们没有吸取过去危机的教训,由于掌权者对变革不感兴趣,或是由于统治者对于如何实现变革未能达成一致,历史上也存在着很多催生了其他危机的危机。

日本在福岛核事故10年之后仍然没有在安全方面吸取全部教训,仍然在依赖核能和碳能源,在实现能源转型的努力上非常滞后。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没有被深入探讨。金融体系

的监管目前虽然有所改善,但深层问题挥之不去:底层阶级收入微薄的问题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新的债务还在继续涌现,尤其是可能比次贷危机更不可承受的助学贷款债务。2008年以来,美国不平等的趋势实际上正在恶化,经济的危机已经催生了民主的危机,其症状包括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政治辩论的高度极化等。

在本书中,我讨论了摆脱当前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必要条件。最首要的条件有赖于就此问题展开严肃研究,制订社会转型方案,不再把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这两大目标对立起来,而是让两者成为统一、共同的社会规划。

要实现这个任务,社会科学和环境科学是最佳搭档,还需要对不同社会的得失进行比较分析,各个社会贫富不一,但都在面临不平等问题和生态制约的回归问题。这一全球性跨学科的调查研究构成了本书的主线。